

廣州格致書院(嶺南學堂) 澳門辦學研究(1900-1904)

夏泉* 劉晗**

本文對廣州格致書院（後更名為嶺南學堂）遷校澳門的原因以及在澳門辦學情況進行了初步探討，並運用《嶺南學生界》等珍貴史料，大致勾勒出了嶺南大學早期歷史上這段鮮為人知的辦學情況。

廣州格致書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是嶺南學堂與嶺南大學的前身，由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哈巴安德於1887年創校於廣州。該校致力於以“最新之學校、最正之道德，以栽培吾華之青年，使出可為國家社會健全之人民，入可謂家庭善良之子弟”⁽¹⁾。孫中山先生的忠實助手陳少白即為格致書院的首屆學生。書院創辦後，由於經費以及哈巴安德個人原因，曾一度與培英學校合辦。尹士嘉博士被任命為監督後，學校於1899年重新設校於廣州四牌樓福音堂內，但此時校舍簡陋，條件艱苦。該年底，鍾榮光先生應尹士嘉博士之邀約擔任學校漢文總教習，也感到此地不利於學校的長久發展，遂將書院遷至廣州花地萃香園。翌年，書院遷往澳門，於該地辦學長達四年，直至1904年方以“嶺南學堂”之名復遷廣州，於河南康樂村（今中山大學南校區）購得永久校址，學校得以安定下來，並開始了近半個世紀的辦學歷程。關於格致書院在澳門辦學這段歷史，由於時局動盪、資料匱乏，且事屬草創，名聲不著，故以往的研究者並未對其進行深入系統研究，凡涉及這段歷史的著述也大多一筆帶過。通過爬蒐史料，筆者搜集到《嶺南學生界》等珍貴資料，即

在此基礎上擬就格致書院遷校澳門的原因、時間以及辦學情況進行初步探討。

格致書院遷校澳門原因

關於格致書院遷校澳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格致書院學生史堅如謀刺清兩廣總督德壽失敗，格致書院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為避免捲入政治漩渦，格致書院遷往澳門暫避。香港嶺南大學官方網站在介紹校史時就採用了這種說法。⁽²⁾另外，劉羨冰編著的《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志》也認為此事是遷校的主要原因。⁽³⁾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義和團運動爆發後影響波及廣東，廣東發生了排外事件，為避免和排外的中國民眾發生衝突，學校遷往澳門躲避。持這一觀點的有陳國欽、袁征所著《瞬逝的輝煌》⁽⁴⁾和李瑞明所著《嶺南大學》⁽⁵⁾以及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的《澳門編年史》⁽⁶⁾。

實際上，在對這一事件進行深入分析就可發現，第一種說法其實純屬臆斷。史堅如謀刺德壽

* 夏泉，暨南大學文學院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基督教教會教育研究。

** 劉晗，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

事件可以算是革命黨人策劃的惠州起義的一部分。惠州起義旋起旋敗，並未對時局造成很大影響，而史堅如被捕後寧死不屈，未向清政府透露半點革命黨的資訊，就算他所在的格致書院成為清政府懷疑的對象，也未必因此而引來重大的麻煩，因此事而遷往澳門反而會加重清政府的猜疑，日後回內地復辦恐怕更會困難重重，這對致力於培養未來中國領袖的學校創辦者們來說，並不是明智的選擇。那麼真實情況到底是甚麼呢？

19世紀末，義和團開始興起，由於清政府的默許，義和團力量得以迅速擴大，但盲目排外的做法也波及中國的各個角落。1900年6月20日，義和團包圍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並炮轟各國公使館，雖然一直未能攻佔，但這種包圍持續了近兩個月。在此期間，南方也發生了嚴重的排外活動。在一些狂熱的老百姓眼裡，外國傳教士和外國侵略者沒有甚麼區別，他們的到來都改變了中國的傳統，破壞了天朝的威儀。因此，盲目的民眾破壞了近十五所長老會的教堂，驅逐了約一百個基督教家庭。傳教士所辦的學校也遭殃及，如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就是因為一張要燒掉學校的佈告而一度關閉，傳教士們都跑到了安全的地方躲避。⁽⁷⁾到7月初，形勢非常嚴峻，廣州已經無法繼續各項辦學活動，師生們祇好匆匆遷往澳門辦學。

而史堅如謀刺德壽事件卻發生在10月。是時，孫中山策劃的惠州起義爆發，被興中會派往廣州策應的史堅如為了牽制清軍力量，決定爆炸

廣東督撫衙門，但由於炸藥份量不夠而未能將德壽炸死，史堅如因其叔父告密，在前往香港途中被捕，在獄中寧死不屈，不久遇害。⁽⁸⁾可見，此時的史堅如已經離開了嶺南學堂，他不可能以嶺南學堂作為謀刺德壽的基地，清政府也不會將這次謀殺事件與遠在澳門的嶺南學堂聯繫起來，至於說格致書院因此事而遷往澳門暫避更是無從談起。

澳門辦學情況

一、學制

書院的創辦者們最初的辦學願望是建立一所完備的基督教大學，但來到澳門後，限於招生及師資情況，最初定學制為“廣學班”，四年畢業，實際上就是四年制中學，很快又改稱“大學預科”。書院採用當時的舊學制，每年陰曆正月為一學年的開始，分兩學期，暑假放假兩月，至十二月結束。當時書院經費緊張，不得不向學生收取學雜費（遷回廣州改大學後才設置各項獎學金）。學雜費每學期繳納一次，須於開學前繳清，繳清後方得入學。所繳各類費用均以港幣為本位，學生須直接繳納給學校在外國銀行的賬戶，這樣就成為後來嶺南大學的成例。⁽⁹⁾

二、師資情況：

格致書院遷往澳門前，在廣州復辦僅一年有餘，師資力量比較薄弱。遷校前的師資情況如下表：

姓名	國籍	來校時間	教授科目	來校前職業	所任職務
尹士嘉(Oscar F. Wisner)	美國	1899年3月	英語及西學	牧師	監督
摩里斯·亞歷山大(Morris. R. Alexander)	美國	1899年3月	物理	電氣工程師	
崔通約	中國	1899年3月	中國古文	辦報人	
鍾榮光	中國	1899年底	漢文	撰稿人	漢文總教習
劉惠士(Clancey M. Lewis)	美國	1900年3月	歷史、地理及體育	礦業工程師	
林安德(Andrew H. Wood)	美國	1900年3月	數學、物理、化學兼校醫	內科醫生	

[資料來源] 簡又文〈嶺南我嶺南〉，《嶺南通訊》，1955年7月第6期，轉引自朱有瓚、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3年版，頁526。

遷往澳門後，學校暫時獲得了一個相對安定成，師資力量也有所擴充。在此四年間，陸續來的辦學環境，各項規章制度、辦學傳統逐漸形成，校任教或幫辦校務的人士如下表：

姓名	國籍	來校時間	教授科目	備註
黃念美(Olin D. Wannamaker)	美國	1902年7月	高級英文、詩詞	
麥基(R. P. Mackay)	加拿大	1903年3月		加拿大佈道團傳教士
葛理佩(Henry B. Graybill)	美國	1903年9月	文學	後曾擔任代理監督
彭美賚(Pomeroy. Owen. E)	美國	1903年3月	英文、科學	
晏文士(Dr. Charles K. Edmunds)	美國	1903年12月	物理學	1908-1915, 1916-1924年任監督
戴仁(Dayan. Sylavan)	法國	1903-1904年 (任教時間)	數學	
佐芝(George. Ruth)	美國	1902-1903年 (任教時間)	英文、書法、 圖畫	
許仲庸	中國		國文	清末進士
廖德山	中國		幫教漢文	博濟醫學院嘉約翰醫生醫學班畢業生，1889年創辦培正書院
徐甘棠	中國			僅見嶺南大學歷史檔案資料第31頁教職員合影
陳榮袞	中國	僅假期應鍾 榮光之邀講 習國文	國文	字子褒，灌根草堂創辦者，著名教育家

【資料來源】李瑞明編《嶺南大學歷史檔案資料》，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2000年，第57-64頁及第152-155頁。

由上表可知，來到澳門後，學校的師資力量有了一定的擴充；不過，也有一些教師在澳門期間就離開了學校，如摩利斯·亞歷山大由於祇與尹士嘉簽訂了三年應聘合同，合同到期的1902年8月，他便離校返美。⁽¹⁰⁾

三、在澳門的教學活動

格致書院創辦伊始，即以中國培育健全人格之人民為目的，所以歷屆負責人都奉行重科學教育而輕宗教教育的辦學宗旨。1893年到1894年任監督的香便文牧師就說：我們建立的學校，“不應當是一所神學校，不應當是一所過分注重宗教教育的學校，而應該是一所國內式的學校，首先學習英文，然後全面學習人文學科”。⁽¹¹⁾尹士嘉任監督後也致力於推行此辦學宗旨，遷往澳門後的嶺南學堂教學中的宗教內容所佔比重遠遠低於中國其它的教會學校，尹士嘉因此而備受保守派

傳教士的非議。書院每週課程，有聖經、英文、地理、歷史、算術、數學（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動物、植物、生理學及圖畫、體操等。⁽¹²⁾這些課程都直接用英文教授，祇有漢語用粵語教授。

澳門地窄人稠，喧鬧的中心市區不適用於學校教學活動的開展，學校於是在大炮臺附近的士多紐拜斯大馬路與雅廉訪大馬路交界處的張家花園租了一排寬敞而舒適的房子作為教室和宿舍。⁽¹³⁾這一地段瀕臨大海，環境十分優越。監督尹士嘉就曾說：“我們有廣闊的田野、小山和海灘，可供我們休憩和研究大自然，也為教師們打網球、學生們搞康樂活動提供了合適的場所。”⁽¹⁴⁾

在中國近現代的教會學校裡，英語是必不可少的教學語言。格致書院創辦伊始，就使用英語進行教學，學生儘管都是中國人，但英語是他們

的必修課之一。遷往澳門前，格致書院存在着其他教會學校學生們英語學習的通病，即用漢語語法套用英語詞彙，漢式英語十分流行，尹士嘉將其稱為“中西混合式的英語”⁽¹⁵⁾。為糾正這一現象，經過學生們的投票表決，學堂制定了一項規則：從早上九點一刻到下午兩點半祇能講英語。為了貫徹這項規則，學校採用“號牌法”來促使師生們互相監督。所謂“號牌法”，即在這段時間裡，任何學生或教師被發現講漢語都必須給聽見他說漢語的人一個號牌，收到兩個號牌可以抵消給出一個號牌，對每人手上的號牌進行記錄。另外在體育比賽中，如果一方隊員講了漢語，就給另一方加一分。⁽¹⁶⁾如此下來，師生們的英語水準都得到了很大的提昇，“中西混合式的英語”開始逐步消失了。

格致書院學生的作息時間表，不同於其它中國自辦學校，也大異於其它的教會學校：每天早上起床後，先做柔軟體操，全體學生必須參加。早飯後為禮拜時間，上午和下午為上課時間，晚上為自習時間，十點一律就寢。星期日上午為主日學課及全體師生員工共同禮拜聽道時間，下午則分為若干組，由教師帶領前往各公園、海濱或風景區遊覽，教師隨時指物講解，提高學生們的自然知識水準。⁽¹⁷⁾晚上則聚集到一起，由尹士嘉監督主持，依次點名，請每位學生登臺自由做英文演說，內容隨機發揮，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學生們的英語水準和口才。⁽¹⁸⁾

格致書院的教師絕大多數為基督教徒，故十分重視人格教育。他們的教學風格，十分注重與學生的交流，除了在課堂上循循善誘之外，平時對待學生，也如自家兄弟一般。教師與學生一起生活、一起學習，以自己的行為作表率，用崇高的品德薰陶學生。教師們還經常對學生進行單獨訓導，以求全體學生的共同發展。⁽¹⁹⁾

除了正常的教學活動，學校十分重視開展體育活動。完成功課後，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前往操場作軍事體操和各種體育運動。澳門加思欄馬路的陸軍操場，經過教師們的努力，借給了

學堂作為學生體育及操練活動的場所。⁽²⁰⁾劉惠士教授曾在美國西北軍事學院進修，他負責訓練學生們啞鈴、棒操運動和行軍。學校後來還組織了學生軍團，成員們都配備有正規的卡其布制服。另外一些西方學校裡很常見的競技性體育如足球、棒球、籃球等也被引入，一些愛好體育活動的教師負責這些活動的訓練。這些傳統後來都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揚，嶺南大學的學生在體育方面歷來都是廣東乃至全國高校的佼佼者。

四、校名變更

遷校澳門後，學校的中文名稱即由“格致書院”改成了“嶺南學堂”，而英文名稱則一直為中國基督教大學（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為了與嶺南學堂的校名配套，學校董事會於1903年3月31日向在其立案的紐約州立大學提出申請，將學校英文名改為廣州基督教大學（Canton Christian College）。5月21日，這項請求得到了批准。⁽²¹⁾

五、宗教及社團活動

儘管格致書院的創辦者們極力想淡化學校的宗教色彩，但作為基督教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學校，各種宗教活動的舉行還是不可避免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和辦學條件下，所能聘任到的教師也都是基督教徒。⁽²²⁾所以，各種類型的基督教活動便成為了嶺南學堂日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基督教團體也是嶺南學堂各種社團中最重要、最活躍的團體。從現存史料中能發現其活動者主要是談道會和自治會：

(1) 談道會

即後來大名鼎鼎的嶺南大學青年會，由鍾榮光先生創辦於1902年9月⁽²³⁾，1905年為了預備聯合萬國青年會，經鍾榮光提議，改名為“青年會”⁽²⁴⁾，以為世界基督教青年會之分支。根據各國青年會共同遵守的“巴黎本旨”⁽²⁵⁾，青年會應為在青年中傳播基督教的組織，所以談道會的機構設置和活動也就是為了在嶺南大學學生中傳播基督教。

談道會設會正（即會長）一名、書記一名，鍾榮光、廖德山曾先後擔任會正。每週三下午沒有漢文課時，既聚集祈禱半個小時，並請會友輪流演說，以達相互交流及宣傳佈道之效。⁽²⁶⁾

談道會初創時，即有二三十人入會，每每聚集之時，亦常有數名未入會者前來旁聽。遷回廣州改稱青年會後，聚集時人數也常有數十。1905年3月又創辦一閱報所，購入各類報刊十餘種，無論會員與否祇要捐銀一元即可入會所閱報。⁽²⁷⁾

(2) 自治會

由校醫兼教習林安德倡辦。其創辦緣由是：“世人動謂有財產、有學問即可出其權而統治世界。吾等竊以為不然。如彼用其財不由正路，或恃所學而逆良心，其結果何如乎，是可決其終不能成偉人也。學生欲為世界公正人，必先依良心而行事，則可抗拒誘惑，亦可互相規諫，是非有自治之權不可也。故本會定名曰‘自治會’。”⁽²⁸⁾可見，“自治”實為“自制”，目的是為了讓學生養成良好的自制力，成為“世界公正人”。

自治會權力頗大，按會章規定，嶺南學堂學生無論是否是自治會成員，都受自治會規則限制。自治會設總理和副理各一名、書記和副書記各一名、司庫一名，由學生出任；值理若干名，由教員充任；並在每個班各設有判斷員和司庫一名，以監督全體同學的行為舉止。

林安德深知中國人私心甚熾、公德尚缺，所以欲從在學期間起就着手培養學生的自制意識，並為自治會制定了兩條最簡便的規則：一、當學生在本班內自修時，不准別人騷擾，違者例罰一仙；二、本學堂之內不准吐口水於地，及投雜物於不當投之處，是皆足害衛生，至於學堂四周，亦不可不潔，違者例罰二仙。⁽²⁹⁾

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實際操作的需要，自治會的會規也逐步完善。1905年第2期嶺南學生界公佈的新會規就增添了學習期間不准嬉笑打鬧、教師未按時到達教室學生也不得喧嘩、自治會職員犯規免職、不得報復指證者、罰款交先生購買圖書等條款。⁽³⁰⁾從這些條款的內容可以看出，自治會實際上充當了嶺南學堂的學生紀律管理者的角色。

除了以上兩個組織外，嶺南學堂還積極參與基督教新教於1877年在上海設立的支那教育會的

活動，該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譯教會學堂所用的一切教科書，並研究討論中國的教會教育，尹士嘉先生就是該會的副總理，黃念美因對教習英文頗有研究，而時時參與該會，並多次在會上發表對英文教學的見解和心得。⁽³¹⁾

六、知名學生

在澳門的這段時期，每屆招收的學生雖然都有幾十人，但最終完成學業的學生卻很少。隨學校從廣州遷至澳門的學生祇有即將畢業的三人，1901年他們完成了學業，其名字分別是錢樹芬、陳廷甲、丁遠顯。他們當中，又以錢樹芬和陳廷甲的名聲最大。

錢樹芬，廣東東莞人。他從嶺南學堂畢業後，又在天津的一所教會學校裡就讀，後隨伍廷芳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並獲得法律博士學位，民國時期長期以律師身份參政：辛亥革命時是南京臨時參議院的廣東省代表，又當選正式國會首屆議員，袁世凱下臺後出任廣東民政司司長，後又擔任過廣州沙面外籍人產業清理委員會委員、廣州市政府顧問、廣東省政府縣長任用審核委員等職務。錢樹芬心繫母校，擔任嶺南大學的董事多年，為嶺大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³²⁾

陳廷甲，廣東番禺人，1910年被清廷選赴美國西點軍校學習，為第一批留美軍校的兩名中國人之一。1914年回國，任北京政府陸軍部科員，陸軍部軍學司第二課長。後赴東北，任中東鐵路警務總處少將顧問。1929年後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高級顧問。⁽³³⁾

由於祇有三名即將畢業的學生隨校遷澳，故1902年至1904年都沒有學生畢業。按照四年制學制，1901年入學的三十三名學生本應於1905年畢業，但這一年僅有三名學生完成了學業，其中之一是鍾榮光。鍾榮光曾中過舉人，但他不滿於晚清黑暗的社會現實，毅然剪辮易服，皈依基督教，並於1896年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³⁴⁾在澳門期間，他除了擔任學校的漢文總教習外，還兼修了英語和自然科學，他後來成為了嶺南大學接回國人自辦之後的首任華人校長。

這屆學生中，還有位成為政界要人的楊顯公，他是廣西六王鄉人，曾任孫中山秘書，後又在黃埔軍校學習，歷任廣西民政廳長、財政廳長、省長、主席等職。

1906年有五名學生畢業，其中一名學生關恩佐獲得了到美國哈威福德學院深造的機會，嶺南董事會還為他提供了獎學金，但條件是他畢業後必須回校任教。關恩佐後來成為了培英男校的校長，並兼任真光女校的校長。這一年的畢業生當中還有一個學生名叫伍希侶，他曾在自治會任司庫一職，獲得了往伊利諾伊大學進修工程學的機會，後來他成為了廣州工務局的工程師，在孫科任廣州市市長時，參與制定了重修毀於1912年大火的部分廣州城的計劃，並參與了廣州大多數道路的規劃。⁽³⁵⁾

在未完成學業的學生當中，也有人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高劍父1903年入校，師從法國傳教士麥拉學習素描，翌年離開學校到日本求學，在日期間積極參加革命運動，回國後成為同盟會廣東分會會長。中華民國成立後，他棄政從藝，歷任中山大學國畫教授、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創立了嶺南畫派。⁽³⁶⁾

七、關於永久校址的波折

遷校澳門本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學校的創辦者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在澳門長久待下去，之所以在澳門辦學時間達四年之久，是因為遲遲未能選定永久校址，並且在選擇創辦地點上，嶺南學堂教師內部、嶺南學堂與紐約董事會之間也發生了爭論。

早在學校還沒有遷往澳門時，學校的教師們就已經開始尋找合適的地方作為永久校址，學校董事會秘書兼司庫格蘭（William Henry Grant）就曾召開董事會議商討購地問題，並多次與在廣州的教師們通信商量此事。⁽³⁷⁾

1900年6月，形勢已經十分嚴峻，在紐約的董事會拍電報給尹士嘉，請他根據形勢尋找永久校址。尹士嘉因此兩次前往香港，在英國不久前從

清政府手裡強租過來的九龍和新界選擇了兩三個很不錯的地方，並且他得到英國官員的保證，可以優先考慮他的購地申請。在與學校全體教師達成共識，並得到格蘭的同意後，9月，尹士嘉向董事會提交了全體教師讚成在九龍設校的報告。⁽³⁸⁾此後的幾個月裡，尹士嘉以及學校的其他教師們在與格蘭的通信中仍然堅持設校九龍的意見。⁽³⁹⁾但到了1901年2月，形勢突然急轉直下，在這個月舉行的校董會開會時，尹士嘉、林安德、劉惠士這些校董們都改變了主意，決定在廣州設校。導致決定改變的原因有二：一是所有被徵求意見的中國人都贊成去廣州；二是如果去九龍，則不能接管與博濟醫院在廣州合辦的醫學班。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創辦此校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影響中國的高等教育，因此必須植根於中國的社會環境當中，若定址九龍，則等於“把發酵粉放到了麵包的外面”⁽⁴⁰⁾。

校址一經確定，一切就好辦多了，學校開始在廣州尋覓合適的土地。但當年並沒有購進任何合適的地皮，因為學校遇到了一個任何西方事物進入中國都會碰上的問題——風水，購地事宜因此暫時擱淺。到1902年10月，學校終於在珠江河南島上覓得了一塊二十畝大小的地皮，但由於這塊地分屬於不同的所有者，又拖延了一年半才買到手。1904年4月，新校區的建設工作終於着手，晏文士對學校進行了勘察，並繪製了地圖，美國青年建築師司徒敦（Charles A. Stoughton）負責了校園的設計。⁽⁴¹⁾暑假期間，教師們紛紛回到廣州，幫助建設新校園。到10月，各項工程終於完工，學校正式搬回廣州，開始了嶺南大學歷史上嶄新而輝煌的一頁。

結語

格致書院遷往澳門這四年，對於日後嶺南大學的發展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書院經尹士嘉博士在廣州復辦之後，規模十分有限，各種規章制度也沒有形成，且處在對中國人排外情

緒的恐懼當中，僅一年時間就遷到了澳門。雖然學校的決策者們並沒有打算在澳門長久辦學，但正是在這四年裡，學校的校規得以逐步完善，校風開始形成，各項優良傳統開始樹立，師資力量也得到進一步加強，如擔任過監督（校長）的晏文士、葛理佩、鍾榮光，以及在嶺南發展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劉惠士、林安德、黃念美，都是這段時間裡嶺南學堂的骨幹力量。在澳門的四年辦學歲月，為嶺南日後的起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成為嶺南大學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頁。

（本文得以成文，澳門大學歷史系湯開建教授、暨南大學華人華僑研究院碩士研究生劉寶真提供了珍貴史料，特此致謝。）

【註】

- (1) 大觀，嶺南學校佈告第十四號，民國六年十一月刊，頁1。
- (2) 嶺南大學。歷史和發展(EB/OL)。http://www.ln.edu.hk/chs/info-about/history，2009年6月9日。
- (3) 劉羨冰：《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志》，鴻興柯氏印刷有限公司，2002年，頁61。
- (4) 陳國欽、袁征：《瞬逝的輝煌》，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頁8。
- (5) 李瑞明：《嶺南大學》，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年，頁25。
- (6)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編：《澳門編年史 第四卷 清後期》，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2088。
- (7) 陳國欽、袁征：《瞬逝的輝煌》，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頁8。
- (8) 梁壽華：《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年版，頁235。
- (9) 簡又文：〈嶺南我嶺南〉，《嶺南通訊》，1955年7月第6期，轉引自朱有瓚、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頁527。
- (10)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歷史檔案資料》，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2000年，頁61。
- (11) 香便文：〈我們將幫助中國人學好英語〉，見《教務雜誌》第12卷(1881年)，頁235-236；香便文：《十字架與龍》，頁427-450，轉引自(美)盧茨J.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頁29。
- (12) 簡又文：〈嶺南我嶺南〉，《嶺南通訊》，1955年7月第6期，轉引自朱有瓚、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頁526。
- (13)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編：《澳門編年史 第四卷 清後期》，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2089。
- (14) (15) (16) 李瑞明：《嶺南大學》，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年，頁25；頁27；頁28。
- (17) 陳子褒：〈記嶺南學堂遷居〉，《嶺南學生界》，1904年第6期，頁26。
- (18) (19) 簡又文：〈嶺南我嶺南〉，《嶺南通訊》，1955年7月第6期，轉引自朱有瓚、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頁528。
- (20)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歷史檔案資料》，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2000年，頁33。
- (21) 李瑞明：《嶺南大學》，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年，頁28。
- (22) 嶺南學堂的外籍教師基本都是美北長老會成員，中籍教師除陳榮袞外，也都是受洗過的基督教徒。
- (23) 〈本學堂談道會述略〉，《嶺南學生界》，1904年第4期，頁44。
- (24) 〈本學堂青年會記〉，《嶺南學生界》，1905年第2期，頁76。
- (25) 1855年8月2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會開第一次大會於巴黎，決定各國青年會宜有一共同宗旨方針，訂立“巴黎本旨”，共同恪守。巴黎本旨是：基督教青年會之旨趣，在聯合同道青年，即凡願按照聖經，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心信躬行為其門徒，更願協力推廣天國於青年之間者。
- (26) 〈本學堂談道會述略〉，《嶺南學生界》，1904年第4期，頁44。
- (27) 〈本學堂青年會記〉，《嶺南學生界》，1905年第2期，頁76。
- (28) (29) 〈本學堂自治會略〉，《嶺南學生界》，1904年3月第1-2期，頁38；頁39。
- (30) 〈本學堂自治會重訂規則〉，《嶺南學生界》，1905年第2期，頁76-77。
- (31) 〈支那教育會〉，《嶺南學生界》，1905年第2期，頁59-63。
- (32) 簡又文：〈嶺南我嶺南〉，《嶺南通訊》，1955年7月第6期，轉引自朱有瓚、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頁526。
- (33) 陳予歡編著：《民國廣東將領志》，廣州出版社1994年版，頁152。
- (34) 余齊昭、李堅：〈鐘榮光傳略〉，《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頁56。
- (35) 李瑞明：《嶺南大學》，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年，頁34。
- (36) 馮伯衡：〈高劍父和嶺南畫派〉，《美術研究》，1979年第4期，頁73-74。
- (37) (38) (39)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歷史檔案資料》，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2000年，頁59；頁60；頁59-60。
- (40) 董黎：〈嶺南大學的創建過程及建築形態之評析〉，《南方建築》，2008年第3期，頁35。
- (41) 李瑞明編：《嶺南大學歷史檔案資料》，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2000年，頁63。